

潘啸龙 著

屈原與楚文化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屈原与楚文化

潘啸龙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金寨路号283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合肥市总工会义兴印刷厂印刷

开本, 787×1092 1/32 印张: 7 插页: 8.25 字数: 175,000

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500

定价: 3.20

ISBN 7-5396-0202-3/1·180

序

忆余方步入弱冠之年，曾学声音训诂文字之学于同里孟乔殷先生；学古文辞于举人子开张先生。二位老师皆淹博，术业有专攻，知名于一时。余接受殷师之启迪，尤喜潜心经学，攻读校点，心摹手写，“始一终亥”尝数过。从而初知掌握我国历史文化宝库之锁钥，略窥其藩篱。

开师平生论文倾向桐城派。当清室末造，桐城耆宿马通伯（其昶）先生，在其未入都任清史馆编修之前，曾假馆合肥李经羲（曾任广西巡抚、云贵总督）家，教其二子国松、国筠有八年之久。日与开师以讥弹文事相往还，为莫逆交。木公李国松以“雄财而文”（陈散原老人先君子《卫钝叟墓志铭》）著称，是时曾捐貲镌版家刻《集虚草堂丛书》，其中收入如《周易费氏学》、《庄子故》、《屈赋微》等，多为通伯先生巨著。以开师擅书法艺术，每分册皆属开师签署其端。

开师晚年曾经开门设讲座，一时群彦云集。所讲授范围，自韩欧苏王唐宋八家，至左史百家无不涉及。于今回首，使我敬慕难忘者，独曾以通伯先生所著《屈赋微》单行本，启蒙式地相授，令自诵习。余初得是书，如获拱璧。退而茫然从《九歌》入手，参以桐城文派选本姚姬传《古文辞类纂》。实不过从文艺欣赏的兴趣出发，不觉自居一室之内，长吟短咏，低回往复，不能自己。继而受《屈赋微》之启发，方知作学科的研究。从此忝登讲坛，教课著文，皆与《楚辞》似

结不解之缘。总而言之，余之粗解《楚辞》，前辈老师实有以“道夫先路”。

潘啸龙同志卓荦富才华。若有宿缘似的，声应气求，对屈子赋产生特殊的爱好。当其攻读硕士学位时，便一心倾注治骚这一课题。在其笃志刻苦钻研、广搜博览的努力下，短短数年间，便撰写学术论文计二十余篇。其中不少篇发表在全国性刊物如《中国社会科学》、《文学遗产》上，显示硕果累累、成绩斐然。赢得楚辞研究界的注目，给学术园地绽开新葩。

啸龙治骚，研究的一系列课题尽管是传统的，但可贵之处，在不作孤立的研究，而是进行系统的综合考察，重视文献与文物考古。所以，在方法上较之前修有很大的提高，视野也较为开阔。例如对《九歌》、《天问》以及屈原的创作特点的研究，能结合历史学、考古学、民俗学、宗教、神话学等多种学科知识，联系楚文化背景，作深入的探讨，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，显得较有说服力。老夫瞠乎后矣！

今啸龙辑其一九八〇年以来所著屈赋研究论文，为《屈原和楚文化》一书，将以问世，求正于当代专家学者。索序于余。余觉年登耄耋，怀旧情殷，因为述往昔前辈先师之影响后进一二遗事，以示“没有继承，就没有创新”之意云尔。

一九八七年初春八八翁卫仲璜

目 录

序.....卫仲璠

第一编 楚历、楚史和屈原生平探索

楚国之用历和屈原降生年月考1

楚在战国时代并用周历和夏历——从“孟陬”
说到屈原自述生辰之用历——屈原生于周历前三四
〇年正月初七日

怀王前期的朝政和屈原的两次放逐.....14

从怀王前期的朝政改革看屈原的被疏——论屈
原在怀王之世曾被“放流”汉北——屈原初放于怀
王三十年，起因是谏“武关之会”——屈原再放于顷
襄王四年，地点是在汨罗一带，兼驳蒋骥“屈原迁
于陵阳”说

关于屈原自沉汨罗的年代和原因.....44

《哀郢》不能作为屈原“殉国难”的证据——
屈原的沉江并非是“殉国难”——对屈原沉江年代
和原因的推测

第二编 屈原主要诗作研究

《离骚》作于顷襄王八、九年考……………60

对《离骚》写作时期的极其矛盾的说法——《离骚》决非作于屈原“被疏”时期——《离骚》的写作地点在江南——《离骚》之作不能晚于顷襄十四年——《离骚》当作于顷襄王八、九年间

《离骚》的“男女君臣”之喻……………71

论《离骚》“自我”形象外在形貌在全诗的不统一——“男女君臣之喻”贯串于《离骚》前半篇——《离骚》后半篇的“求女”实为“男女君臣之喻”的延续——“吾令帝阍开关兮”乃是求取“玉女”——《离骚》后半篇的求“女”非指怀王而指顷襄王——《离骚》“男女君臣之喻”的创造和来源

《九歌》的性质、结构和祭神形式之谜……………89

从“天穆之野”看夏启《九歌》在“沅湘之间”的流传——非“俗”非“典”的《九歌》“祭祀之礼”——评“助却秦师”说和“哈雷彗星”之证——《九歌》的篇目结构之谜——《九歌》的祭神形式：“非象神，神物不至”——深沉动人的人生感喟

对于《天问》写作年代的推测……………123

《天问》的诞生、抒愤特点和问难艺术……………130

庙堂壁画：《天问》诞生的远背景考察——“问天”形式的由来和《天问》的非宗教性质——从屈原的情感迷狂说到《天问》的抒愤特点——奇

气纵横的《天问》“问难”艺术

《九章·惜诵》——放流汉北的明志之作162

《哀郢》非“哀郢都之弃捐”167

《哀郢》抒写的是无罪弃逐、九年不复的哀思

——《哀郢》作于再迁江南的顷襄王十三年——

“白起破郢”说与《哀郢》的内容不符——《哀郢》

开头四句说的是怀王客死的放逐背景

《远游》应是汉人伪托屈原之作181

《远游》之“去”与《离骚》、《九章》之“去”是一

致的吗？——《远游》的“神仙思想”流行于战国时代

吗？——《远游》写“南方”表现了屈原“寄托之情”

吗？——从文风、语法和音韵能判断《远游》的作者

吗？

第三编 楚文化和屈原的思想、艺术

屈原思想及其发展线索192

一场延续两千余年的论争——大变革时代造就

的一位杰出思想战士——在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中发

展的屈原思想——改革家的悲剧和伟大爱国者的光

辉

楚文化和屈原217

自立于南方的楚民族——存在着奇异矛盾的楚

文化——从楚文化的背景看屈原的创作

自 跋252

第一编

楚历、楚史和屈原生平探索

楚国之用历和屈原降生年月考

在我国古代文化史上，屈原正如一轮光焰喷薄的太阳，升起在充满南国情调和浪漫气息的南天雄楚，挟带着无限的热量，燃烧着、运转着。他一身而兼有古希腊诗人荷马和中世纪哲人但丁的气质，以忧愤动人的吟唱，震撼了千秋万代人的心弦。屈原精神是构成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元素之一，屈原是我们无限深厚的大地母亲早期孕育的一位伟大骄子。

诗人屈原的出现，过去、现在、将来，都是令人惊奇而困惑的谜。如果说，屈原的一生经历、辉煌诗作，在人们情感上留下的，是一个划自宏伟苍穹的巨大惊叹号；那么，它在人们理智上留下的，则又是一个铺展大地的问号。当年，这位南国哲人曾面对楚之宗庙壁画，向着荒古的神话、逝去的历史以及天地万物，发出过无数充满睿智的迷狂叩问；自那以后，成百成千的屈赋研究者，则对屈原自身——他的出生、他的身世、他的炳彪古今的诗作及其充满创造奇思的艺

术表现，发出了同样惊异而经久不舍的探究之问。

正是这些探究之问，汇成了两千年来屈赋研究奔腾不息的洪波大川。它们自然也成了本书作者从事这项研探工作的重要起点。在这部篇幅不大的著作中，读者将与作者一起，步入这座布满“千古之谜”的奇宫，带着满腹疑思，面对屈原生平及其伟大诗作中的一系列重大课题。诸如：屈原这位南国诗人，究竟降生于什么年代？他那延续十七八年的放逐生涯，究竟是由什么原因促成的？屈原怀石自沉，是否是“殉国难”？倘若不是，他又为什么要“忿怼”沉江？屈原的《离骚》，为何采取了大起大落的“跌转”式结构方式？而推动《离骚》后半篇情节发展的五次神游“求女”，又隐喻着什么？屈原改作的《九歌》，与传说中的夏启《九歌》有何联系？有人运用哈雷彗星的出现周期推算《九歌》的作期，对吗？《九歌》的降神、祭神方式是怎样的？它有何民俗学的依据？《天问》的诞生，是否带有某种偶然性？它那一问到底的形式，又来源于什么？为什么说，这首在内容上带有清醒理智的哲理诗，却是诗人“情感迷狂”中的产物？它的“抒愤”又具有什么特点？在屈原的创作中，是否表现了一些明显的矛盾现象？这些矛盾现象，与楚文化自身所包含的矛盾有没有关系？屈原是否“忠君”？屈原精神的突出特征是什么？等等。所有这些，正如矗立于埃及哈夫特金字塔前的狮身人面兽“司芬克斯”所提的难题一样，不断激发着人们思索、推究的浓厚兴趣，并被“逼迫”着作出自己的判断和回答。由于课题的相对专业化，阅读本书自然不象参观、游览一样轻松愉快，但它毕竟还是饶有兴味的。

作为本书的开篇，我们首先要探讨的，是关于屈原的降

生年代。屈原的降生年代，是屈原研究中烦扰了许多研探者心神的一大疑案。由于第一位为屈原作传的司马迁，对诗人的降生年代未置一词，这便造成了后世推算屈原生年的巨大困难。唯一可供人们作为研究依据的，是屈原《离骚》的开头数句：“帝高阳之苗裔兮，朕皇考曰伯庸。摄提贞于孟陬兮，惟庚寅吾以降。”按照汉人王逸的注释，屈原的出生年月，正包含在这后两句之中：屈原降生于古代岁星纪年的“摄提格”之岁正月庚寅那一天。

这似乎解决了屈原降生年代的难题，其实不然。因为古代的岁星纪年，运用的历法有天正（周历）、人正（夏历）之区别。按照这不同的历法，推算的屈原生年，因此也就有不同。近些年来，大多数研究者以为，楚在战国时代行用夏历（人正）；诗人在自述生辰时所用的“孟陬”，也是“夏历正月”的专称。根据这些，郭沫若、浦江清、汤炳正、何幼琦、胡念贻诸学者，分别算出了屈原的生辰年、月^①。1980年，陈久金先生发表《屈原生年考》一文^②，大胆提出“楚用周正”（天正）之说，算出屈原的生年当为前341年正月庚寅。由于缺乏确切的根据，人们对此意见尚在疑信之间。我则比较倾向于陈久金先生的意见，下面试分别加以论述之。

一 楚在战国时代并用周历和夏历

探讨屈原自述生辰用的是什么历法，有一个重要前提，

① 郭沫若以为屈原降生于公元前340年正月初七；浦江清则以为当在公元前339年正月十四日；汤炳正以为在前342年正月；胡念贻则提出屈原生于公元前353年正月二十三日（江西大学钱贵成与胡氏之说同）。

② 见《社会科学战线》1980年2期。

即楚在战国时代究竟行用何历？由于屈原《离骚》、《九歌》、《抽思》、《怀沙》等诗中，不少地方称述物候用的是夏历用语；加之1942年在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《帛书》，其所记十二月名及四时划分亦同夏历，学者们因此断言，楚在战国行用夏正，并无行用周正之例。这样说来，陈久金提出的“楚用周正”说，便毫无根据了？不。前些年在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《日书》甲种《岁篇》，有一份《秦楚月名对照表》。从其所记楚之十二月名用历情况，参照其它出土文物，我们可以确凿无疑地说，楚在战国时期，其实仍在行用周历。为了探讨的方便，先将秦简所记《秦楚月名对照表》移录如下：

秦	十月	十一月	十二月	正月	二月	三月
楚	冬夕	屈夕	援夕	刑夷	夏辰	笏月

秦	四月	五月	六月	七月	八月	九月
楚	七月	八月	九月	十月	爨月	献马

从此表所反映的秦之用历看，秦历以夏正十月为岁首，九月为岁终，属于“颛顼历”。但秦之行用颛顼历，只改岁首而未改月次及四时搭配，所以它不称夏历十月为正月，也不改夏历正月为四月，其四时（春、夏、秋、冬）搭配仍同夏历。

那么此表所记楚之十二月名所反映的用历情况又如何呢？在此十二月名中，最引人注目的是“冬夕”和“夏辰”这两个楚月之名。楚人在对应于夏历十月、二月的两个月分

上，冠以“冬”、“夏”之称，反映了一个重要事实：按照楚之历法，这两个月分属于一年四时中的“冬”和“夏”。也就是说，夏历十月在楚历属“冬”，夏历二月则属“夏”。但按照四时分配，冬、夏之间还隔着三个月的“春”。而在楚十二月名中，从“冬夕”到“夏屈”，中间恰好隔着三个月。因此，夏历之十一、十二、正月，在楚历中正是作为“春”时来看待的。众所周知，“夏正”以正月、二月、三月为“春”；“周正”则以夏历之十一月、十二月和正月为春；至于颛顼历，虽然以十月为岁首，但四时搭配仍与夏历相同。上述楚之十二月名反映的四时搭配，恰恰不同于夏历而同于周历。其所依据的历法，不是“周正”又是什么？再从岁首来看。在上述对照表中，楚之岁首似乎是“冬夕”；也有的研究者因为有了“楚用夏正”的先入之见，断言楚以“刑夷”为岁首，这都是误解。从楚之月名与四时的搭配情况看，楚月之“屈夕”，在楚历中才是孟春正月；至于“刑夷”，则已是季春。在先秦古历中，并无一种历法是以季春之月为岁首的。与此同理，楚月之“冬夕”，在楚历中属季冬，以季冬为岁首，先秦古历亦无此例。因此，从楚月名与四时搭配情况看，它既没有以夏正正月（刑夷）为岁首，也未以夏正十月（冬夕）为岁首，而是以夏正十一月的对应月“屈夕”为岁首的。这样的岁首确定方式，在历法上正是依据了“周正”而不是“夏正”。但由于《秦楚月名对照表》的制作，出于秦人之手，在其对照时，自然会以秦之用历为本位，而以楚之月名与之对应。这才造成了楚历似乎也以夏正十月（冬夕）为岁首的印象。

楚之十二月名的确定，反映了其所用历依据的是“周

历”，已如上述。按照何幼琦先生的考察，甲骨文中只有“春”、“秋”而无“冬”、“夏”之语，由此可以推断，楚人制定这一套月名的时间上限，不会早于西周。又根据《左传·庄公四年》所记，楚之记事在此年已出现“荆尸”（刑夷）之名，说明这一套楚之月名已在春秋时期行用，并不是战国时期才制定的^①。可见，楚在春秋时期行用的历法应是“周历”（天正）。现在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，到了战国时代，楚国是否还在行用周历呢？我以为，楚在战国时代并未废止周历，而是在继续行用。其证据如下：

根据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竹简《编年纪》，此墓墓主喜，出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（前262），卒于秦始皇三十年（前217）。他的大部分仕宦生涯，是在秦占楚地安陆和鄢度过的。他之所以要在任职期间搜集楚历之月名^②，并与秦历对照记录在册，说明依据周历制定的楚之月名，直到战国末期仍在楚地沿用；即使楚地陷于秦人之手，该地的楚人也未改变习惯的楚历和月名，并在日常生活中继续行用。正因为如此，喜在安陆一带任职时，有必要对秦楚的不同用历和月名对照制表，以便查考。倘若楚人已改行夏正，其与秦历就只有岁首之不同，又何必造此对照表？

需要指出的是，运用这一套楚月专名的，不仅是安陆地

^① 见何幼琦《论楚国之历》，载《江汉论坛》1985年10期。

^② 在楚之十二月名中，“七、八、九、十”四个月名，用了数序月名，而且计算显然是以夏历十月为岁首的。这究竟是什么缘故？何幼琦先生分析说：“可以设想，在被占领的安陆地区，并存在着两套月名，一套是楚国传统的月名……另一套是在被占领后新出现的数词月名”；“秦简中的十二个楚月，分明是由两套拼凑出来的，即八个楚国的专名，四个楚地被占领后的新名。其所以要拼凑的原因，多半是喜在任职的初期只接触到那八个专名……才将经常见到的数词月名补充了进去”。这一分析比较合理。

区，而且遍及楚之郢都的整个上层。1965年冬，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的竹简，就有“郢客困于郢王于戮郢之岁，刑厪之月，癸未之日”以及“允月癸丑”、“献马之月”等记载。其所用月名（“刑厪”、“献马”），正与“对照表”所列楚月之名相同。据考，望山一号楚墓墓主邵固为楚悼王曾孙，“可能死于楚威王时期或楚怀王前期”^①。1957年寿县出土的《鄂君启金节》，其铭文有“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，夏厪之月，乙亥之日，王居于戮郢之游宫”等记载，所用月名也与“对照表”有关楚月名相同。由此可知，楚之十二月名，虽然不是战国时才制定，但它的行用，自战国中期直至楚考烈王时代，从楚之朝廷到陷于秦人的安陆地区，均袭用不改。由于这十二月名的制定，并不是随心所欲，而是以周历为依据的，它所确定的“岁首”和“四时”划分，是统一在“周正”这一历法系统中的。因此，这套月名的继续沿用，标志着它所依据的周历仍在行用。倘若只保留这套月名而改用夏历，就会出现月名为“夏”（夏厪）而时令为“春”的矛盾（楚“夏厪”之月在夏历为“仲春”），在实际使用中就会造成混乱。由此可以看出，楚国直至战国时代，仍在继续行用周历，起码在官方机构中是如此。

但是，从长沙子弹库出土的《帛书》所记月令，以及屈原《离骚》、《抽思》、《怀沙》中的有关诗句，如“夕餐秋菊之落英”、“望孟夏之短夜”、“滔滔孟夏，草木莽莽”等用语看，所用历法显然又是“夏正”。这又该作何解释？我以为，这些事实说明，楚在战国时代，除了行用周历外，

^① 见陈振裕《望山一号楚墓的年代和墓主》，刊《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》。

同时还行用着夏历。特别是在民间，为安排农事稼穡，行用夏历更方便。这就形成了周、夏二历并用的情况。对于这一点，我在前些年所作论文中，在修正陈久金先生关于“楚用周正”说时，就作过解释^①。由于大多研究者否认楚在战国时期也行用周正，我的论述就侧重在证明楚用周历这一点；至于同时还行用夏正，人们并无多大争议，这里就不多说了。

二 从“孟陬”说到屈原自述生辰之用历

证明了楚在战国时期还有行用周历的现象，就为探讨屈原自述生辰是否也可能运用周正，提供了重要前提。不过，为了使这一探讨在实际上可信而能说服人，我们还得解决《离骚》自述生辰所用的“孟陬”之疑。

许多研究者认为，“孟陬”乃是“夏历”正月的专名。屈原在自述生辰时，既然用了“孟陬”之名，必是指的夏历正月，所以推算屈原的降生年月，自应从夏历推算才对。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呢？我以为并不正确。秦汉之际的许多典籍可以证明，“孟陬”并非是夏正正月的专称，而周历、殷历的岁首正月，也可称作“孟陬”。先看《尔雅》。《尔雅》说：“正月为陬。”这“正月”是特指“夏正”的吗？显然不是。按《尔雅》之例，凡夏、商、周三代同物(事)而异名的，必分别标出之。如祭名：“绎，又祭也。周曰绎，商曰彤，夏曰复胙。”又如年名：“载，岁也。夏曰岁，商曰祀，周曰年”等等。至于三代而同称的，《尔雅》则直书其名，

^① 见拙作《摄提·孟陬和屈原生年的再探讨》，刊《中州学刊》1985年4期。

并不加以区别。如猎名：“春猎为蒐，夏猎为苗，秋猎为獮，冬猎为狩”；祭名：“春祭曰祠，夏祭曰禴，秋祭曰尝，冬祭曰蒸。”在这些例子中，四时之称，就不是特指“夏正”，而是兼及殷正、周正了。正因为如此，《春秋》僖公二十八年记：“冬……天王狩于河阳，”昭公二十二年记：“春，……大蒐于昌间”；《鲁颂·阙宫》：“秋而载尝”；《周颂·丰年》：“为酒为醴，烝畀祖妣。”历法用的均非夏正（《春秋》、《鲁颂》、《周颂》均用周正），而猎、祭称谓兼同《尔雅》。所谓“正月为陬”，当然也同此例。如果它只是“夏正”之特称，《尔雅》理应更举“殷为某、周为某”而加以区别之。《尔雅》没有这样做，恰好证明：“正月为陬”乃为三代岁首正月之统称，并非专指夏历正月。这也可以从司马迁、刘向的有关著述中得到证明。《史记·天官书》在概述了黄帝、颛顼立星官、定历法的历史后，说：“其后三苗服九黎之德，故二官咸废所职，而闰余乖次，孟陬殄灭，摄提无纪，历数失序。”文中所说之“孟陬”，其非专指颛顼历（夏历）之正月，而亦兼及黄帝历（周历）之正月，是毫无疑问的。刘向《复上奏灾异书》说得更明白了：“昔孔子对鲁哀公，并言夏桀、殷纣暴虐天下，故历失则摄提失方，孟陬无纪，此易姓之变也。”孔子言：“孟陬无纪”，而兼举夏桀、殷纣。可知无论是夏正，还是殷正，其岁首正月，均得称为“孟陬”。

这样看来，“孟陬”并非为夏正正月之专称，周正正月当然也可称为“孟陬”。屈原《离骚》自述生辰，用了“孟陬”之月名，就不能断言其所用历法必是“夏正”。在我们证明了楚国在战国时代，也还行用着“周正”的前提下，这

样的断言就更显得缺少说服力了。

三 屈原生于周历前三四〇年正月初七日

那末，《离骚》“摄提贞于孟陬兮，惟庚寅吾以降”，用的是“夏正”还是“周正”呢？我以为是陈久金先生所说的“周正”。我们且看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和《史记·天官书》对于岁星纪年十二岁名的说明——

太阴在寅，岁名曰摄提格，其雄为岁星，舍斗、牵牛，以十一月与之晨出东方。东井、舆鬼为对。太阴在卯，岁名曰单阏，岁星舍须女、虚、危，以十二月与之晨出东方。柳、七星、张为对。太阴在辰，岁名曰执除，岁星舍营室、东壁，以正月与之晨出东方。翼、轸为对……（《淮南子》）

以摄提格之岁：岁阴左行在寅，岁星右转居丑，正月与斗、牵牛晨出东方……单阏岁：岁阴在卯，星居子，以二月与婺女、虚、危晨出……执除岁：岁阴在辰，星居亥，以三月与营室、东壁晨出……（《史记》）

对照一下两书所记岁星纪年十二岁名内容，两者基本一致。只是《淮南子》所说的“十一月”、“十二月”、“正月”，在《史记》则改成了“正月”、“二月”、“三月”。两书所记月序的不同，说明它们使用了不同的历法：《淮南子》所说“十一月”、“十二月”、“正月”，用的是“夏正”月序；而《史记》用的则是“周正”月序，因此变成了“正月”、“二月”、“三月”等等。说清了这一点，我们可以